

對桑德爾和陶尼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反思

洪子雲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在他的《優績的暴政》一書中指出，民粹主義近年來在美國和西歐興起，部分原因是民眾對優績主義 (Meritocracy) 制度下政治精英的狂妄自大感到不滿。英國脫歐和 2016 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反映了技術官僚治理的失敗和憤怒人們的批判 (TM: 12-13)。¹ 桑德爾早年成名源於他對羅爾斯 (John Rawls) 自由平等主義的批判，給一般人的印象是他支持傳統的優績主義，所以他最近此書對優績主義的嚴厲批評，不禁令人懷疑他是否改變了立場。但桑德爾在接受採訪時解釋他的哲學是繼承自陶尼 (R.H. Tawney) 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傳統，² 本文探討桑德爾和陶尼的經濟倫理，看基督教

¹ Michael Sandel,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21). 之後在內文注簡稱 TM，並顯示頁數。

² Julian Com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Sandel: 'The Populist Backlash has been a Revolt Against the Tyranny of Merit'," *The Guardian* (6 Septem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sep/06/michael-sandel-the-populist-backlash-has-been-a-revolt-against-the-tyranny-of-merit>> (accessed 27 December 2022).

社會主義可如何回應今天在英美的自由主義和優績主義所產生的社會問題。

一 桑德爾對美國優績主義的批評

民粹國族主義的出現一般被認為是出於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的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白人男性中心主義的政治動機，也有人認為這是貿易全球化的結果，許多工作崗位因此被淘汰，外包給其他工資較低的國家，或被機器取代，導致了因失業引發的抗議浪潮。桑德爾承認這些都是問題，但他認為更主要是出於過去的管治者的過錯，他們推動了自由市場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的進程，這些進程起源於戴卓爾和列根（Thatcher and Reagan）時代，後來獲得了克林頓（Bill Clinton）和貝理雅（Tony Blair）的繼承政策，導致大量失業，助長了社會敵對氣氛和公眾不滿。全球化雖然讓上層階級受益，卻讓升斗市民感覺自己只能任人宰割，許多人覺得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被拋棄，造成敵意，降低了人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忠誠度，弱勢羣體甚至覺得勝利者不尊重他們。民主黨和政客在解決日益加深的的不平等和金錢在政治中日益增長的影響方面幾乎無所作為（*TM*: 17-22, 62）。

過去都說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充滿機遇，美國人一直相信接受高等教育能讓有才能的人向上攀升，只要每個人都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市場經濟就會獎勵人們應得的東西。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全球化下的人們得到的回報其實並不均衡（*TM*: 22-24）。從二戰結束直到七十年代，沒有大專文憑的美國人還是可以找到好工作，養家糊口，活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今天卻困難得多。過去四十年大專和高中畢業生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雖然整體經濟確實增長了很多，但美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以來的增長大部分都進入了最頂層 10% 的人的腰包，最底層的 50% 根本沒有任何得益，還有很多藍領失業。大多數在貧困家庭長大的人仍然貧困，真正能夠向上發展的人寥寥無幾，大多數出生家庭貧窮的

人長大後依舊貧窮，「向上流動說」（Rhetoric of Rising）已經不再打動人心（*TM*: 71-73）。

優績主義還造成了一種文憑主義偏見（a credentialist prejudice），即以大學文憑判斷個人價值和人格，破壞了工作的尊嚴並貶低了那些沒有上過大學的人（*TM*: 73, 85）。美國的高等教育已成為一種贏家通吃的篩選機制，加劇了不平等和世襲優勢（*TM*: 11, 165-67）。這種篩選機制也意味着低級別的工作在市場上的價值不如高薪專業級別的工作；認為這些工人對共同價值（common good 或譯「共善」）的貢獻較少，因此不值得社會認可，損害勞動者工作尊嚴（*TM*: 197-99）。社會對向下流動的恐懼愈來愈強烈，上大學變得很重要，選擇名牌大學成為防止向下流動的最佳保障（*TM*: 12）。直升機父母甚至向大學捐贈巨額資金，聘請招生顧問或賄賂教師，以求進入名牌大學。他們想要的是名牌大學授予的精英聲望（*TM*: 12-13）。文憑主義偏見亦反映「精英傲慢的症狀」（a symptom of meritocratic hubris），它暗示就業不足問題是由於人們缺乏教育，是咎由自取，導致低學歷者的污名化（*TM*: 89-96）。這種不尊重甚至屈辱的感覺不僅使失敗者感到自卑，而且容易煽動政治情緒，是支持民粹主義的重要因素（*TM*: 26）。

在過去傳統貴族制（Aristocracy）中成長的人，內心深處都知道自己是靠父母的財富和權力，而不是靠自己的才能或功績登上頂峰的。而下層的人會覺得自己只是沒有富有的父母或機會，而不是低人一等。即是無論是贏家還是輸家，都不認為自己的獎賞是應得的。但優績主義為那些在這制度下茁壯成長的人製造了虛假的自豪感。成功的人會覺得自己考上了名牌大學，或者在專業和商業領域獲得了高薪工作，所有相關的回報都是他們努力和能力所應得的，看不見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們的家庭背景，儘管他們有付出努力，但他們的好運使他們能夠通過金錢獲得優質的教養、額外的輔導和許多額外的活動，以及上層精英之間的友誼網絡（*TM*: 12-13, 24-5）；勝利者變得傲慢自負，甚至蔑視或貶低失敗者（*TM*: 226）。

除了加劇不平等之外，美國優績主義下高等教育的另一個問題是它也會給勝利者帶來創傷。高中時代變成了一個充滿先決條件、輔導、運動訓練和各種課外活動的高壓力、高焦慮、睡眠不足的廣場。桑德爾引用了心理學家萊文（**Madeline Levine**）的研究結果，她說出身富裕、外表出類拔萃的青少年實際上非常不快樂，情緒困擾率高於一般青少年，性格疏遠，而且許多人看起來很沮喪、焦慮和憤怒。他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往往會指望別人幫忙鋪路，在生活中也會依靠別人來打開關節。在精英社會，人要不斷突破，不斷取得成功。但雖勝則傷，形成了「完美主義的隱患」（**hidden epidemic of perfectionism**），長年的焦慮和奮鬥讓年輕人自卑，不斷靠成就感來養活自己，容易受到家長、老師、招生委員會嚴厲的評價和自我評價的影響（*TM*: 177-83）。

此外，桑德爾觀察到，在優績主義影響下，政府往往堅持社會和政治問題最好由受過高等教育、價值中立的專家解決，逐漸形成他所說的「賢能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這是一種腐蝕民主並剝奪普通公民權利的技術官僚的自負（*TM*: 73）。例如，奧巴馬總統在任時傾向於聘用名牌大學畢業的高學歷人士，認為高學歷的人治國較好。但歷史告訴我們，高等教育與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關係不大，也與辨別共同價值的能力無關（*TM*: 90）。奧巴馬任命的大多數人都帶有某種傲慢和不人道的味道；他們與大多數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脫節，最終在金融危機面前做出錯誤的決定，放鬆對金融業的管制，印鈔救助投資銀行，而不是追究銀行的責任，讓銀行不用為他們造成的危機負責，反而為此失去家園的人沒有得到任何幫助；隨後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激起了憤怒（*TM*: 19-22, 90）。

二 優績主義的神學根源

桑德爾指出優績主義源於聖經創世記和出埃及記中「萬事皆有因」之說，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是對良好行為的神聖獎賞；乾旱和瘟疫是神對罪惡的懲罰。桑德爾認為這是優績主義思維的起源，反映人們相信

這道德世界的法則是「美德帶來成功，惡行必致苦」，桑德爾稱之為優績主義宇宙觀（A Comic Meritorcracy；*TM*: 35）。優績主義宇宙觀強調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它雖主張神是賞善罰惡的，但這是一幅高度以人類為中心的畫面，反映神只是按法則回應人的行為。並且優績主義宇宙觀會引致對遭遇不幸的人持有嚴苛的態度，認為一切的不幸是個人惡行導致的，所以約伯記中約伯的三個朋友認定約伯犯了彌天大罪，要他回想自己做了甚麼孽並認罪。但上帝向約伯顯現，並指出並非所有事都是對人類行為的獎罰，創造主的作為並非人能完全了解，上帝宣告了祂創造的主權，並教導約伯學會謙卑（*TM*: 35-37）。

其實在基督教救贖論的神學史中亦有個人責任和上帝恩典的爭議——人可否靠善行得救？早期基督教有伯拉糾（Pelagius）就強調自由意志和個人責任，卻被奧古斯丁認為是否定了上帝的主權，並削弱上帝的恩典。雖然奧古斯丁堅持認為獲得救贖僅有憑藉上帝恩典，教會實踐中又透過一系列聖禮將賞善罰惡的觀念引入了教會，以致之後宗教改革時路德批評天主教出售贖罪券的腐敗行為，並繼承了奧古斯丁的觀點，強調救贖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並不會受任何試圖取悅上帝的行為或禮儀影響，得救與個人功績無關。像路德一樣，另一改革家加爾文亦強調救贖純粹是上帝的恩典，並且神早已預定，而與人類的功過或應得無關。但加爾文的預定論卻為美國帶來了強大的優績主義工作倫理。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由於心理上難以忍受不確定自己是否蒙揀選，人們為確定自己獲上帝選中，各人都盡力做好工作，並積累資本，以回應神的呼召，並視之為救贖的標誌。這清教徒的工作倫理為資本主義提供發展動力，但這慢慢亦引發了一種想法，認為自己蒙揀選或多或少與自己的表現有關，甚至漸覺得救贖是人們自己贏得的，並讓優績主義思想捲土重來（*TM*: 37-41），形成一套天命論（providentialism，或譯「神的護理論」），強調人的能動性和自主性，加上相信上天是賞善罰惡，故認為個人成就和好運都是應得的，不幸的人所經歷的不幸亦都只是他們自己應得的，這天命論起源於福音派新教，並最終佔據了社會價值觀的主導地位，並於最近幾十年充分表現於

成功神學上（*TM*: 46）。而在世俗化的世界中，儘管加爾文主義者關於預定論和人性本惡的思想消失了，這更亦漸成為一套「**沒有神的天命論**」（*providentialism without God*；*TM*: 42）。而在國家層面上則以此解釋美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美國踐行善德，於國際政治上，自由主義者則視實行自由、民主為「歷史正確的一邊」（*TM*: 49-53）。

三 生產者與工作尊嚴

桑德爾認為，失業問題不僅僅是缺乏收入，而是失去工作剝奪了一個人為社會公益做出貢獻的機會。自由主義者只知道如何不斷為工人和中產階級提供更多的分配正義和全面的經濟增長，但桑德爾認為，這些選民想要的是更多的貢獻正義，即提供他人看重的東西，以贏得社會認可、尊嚴和機會（*TM*: 206）。從二戰結束直到七十年代沒有大專文憑的美國人還是可以找到好工作，養家糊口，活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今天卻困難得多。過去四十年大專和高中畢業生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美國製造業工作數目從 1950 萬減少到 1200 萬個，生產力雖然提高了，勞工從自己生產所得收入卻愈來愈少，大部分都到了執行長和股東手上。全球化帶給高學歷者好的報酬，卻對大多數一般勞工無幫助。這大學篩選機制告訴勞工，他們的工作在市場上相比高薪職業階級的工作較沒有價值，對共同價值貢獻較低，削弱勞工的工作尊嚴，因此較不值得社會給予認可與尊嚴（*TM*: 197-99）。自由派只懂得不停提供勞工和中產階級更多的分配正義，公平全面的經濟成長，但桑德爾認為這些選民要的是更多貢獻正義（*contributive justice*），即提供別人所重視的事物以贏得社會認可與尊嚴的機會（*TM*: 206）。

桑德爾提出我們同時是消費者亦是生產者，全球化是講求經濟增長，代表消費者利益至上，消費者希望金錢的效用愈大愈好，產品服務愈平愈好，消費者視共善為個體偏好和利益的集合，以追求整體利益最大化；他們極少在意工作外包、移民、經濟金融化對生產者福祉的衝擊（*TM*: 206-7）。而生產者希望工作令人滿足，同時亦有不錯的報酬

(*TM*: 206-7)。生產者以公民角度出發探討共善，他們批判並反省自己偏好，以提升及改進自己，並與其他人一起思考如何達致公正、良善的社會，培養公民，共同探討政治社羣的目的，故此制度上需要公共審議的管道，並且若從公民角度思考，人對社會的貢獻不可以薪資衡量，而是來自公民道德判斷。桑德爾承認市場本身不會提供勞動者技能和認可，因此黑格爾提議設立一種類似同業公會或行會的機構（*trade association or guilds*），確保工人提供的技能終會做出值得公眾認可的貢獻，他引述霍內特（*Axel Honneth*）簡要描述這兩個條件以致勞工階級可得適當認可：（1）必須有最低工資；（2）必須賦予所有工作一個形態，讓人明瞭它對社會共善的貢獻（*TM*: 211）。桑德爾引用馬丁路德金的講話，並預言我們的社會終一天會尊敬清潔工人，歸根究底因為社會要生存下去，收垃圾的人和醫生一樣重要（*TM*: 210）。

在政治兩極化時代，桑德爾認為貢獻正義和工作尊嚴應該進到公共論述才對，但現實是二十世紀以來生產者倫理逐漸消逝，被消費主義自由觀及經濟增長導向的政治經濟路線所取代，因為人們都喜歡消費，並且在消費主導的社會中強調價值中立。但貢獻正義對自我完滿和人該如何過活並不是中立的，從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到美國共和黨傳統及天主教社會訓導，這些貢獻正義論教導我們惟有對社會共善作出貢獻，從而贏得同胞的敬重，人生才最完滿，根據這思想，人的基本需求是被共同生活的人認同，而工作尊嚴就是發揮一己能力滿足他人的需求（*TM*: 210-2）

其實按以上桑德爾的分析，精英的傲慢和平民的憤恨只是因為家庭背景貧富不均，以致上大學，甚至向上流動機會不等，這樣，推動社會機會平等豈不就可以解決問題嗎？桑德爾指出美國常強調機會平等，但機會平等只是補救措施，不該是良善社會的終極理想。人們見到少數人能成功上位，就以為其他人也能擺脫困住他們的條件，但事實並非如此。桑德爾建議的做法不是修補條件，而是建構一套用社會流動內解決不平等的政治綱領。單單強調向上流動，對社會紐帶、愛國與公民連結幾乎無幫助，甚至只會令人際間不停競爭，害怕被人搶走飯碗，

而執政精英的解決方案就只是上大學。民主需要社會紐帶與公民連結，就算有一個比現在美國更能讓人向上流動的社會，它也需要讓沒有能力向上爬的人有機會實現自我，並感覺到自己是共同體的一員，由於美國未能做到這一點，使得學歷不高者生活艱難，甚至懷疑自己被排擠於社會之外（*TM*: 224-26）。桑德爾並非提倡結果均平，並非要徹底平等，他主張要**超越機會平等，追求「條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他引用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陶尼主張一種廣泛的、民主的「條件平等」，使各行各業的公民都能昂首挺胸，並視自己為社羣共同事業的參與者。如陶尼強調：「社會福祉……取決於凝聚力和團結。它不僅意味着存在個人提升的機會，而且意味着高水平的羣體文化和強烈的休戚與共的意識……。個人幸福不僅要求人們可以自由地上升到舒適和卓越的新位置；還要求他們無論是否出人頭地也能夠過上有尊嚴和有文化的生活。」（*TM*: 225）但桑德爾並沒有討論陶尼的條件平等是甚麼意思，所以要進一步了解桑德爾的社會經濟理論，必須先簡單探討陶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四 陶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一書中，陶尼慨歎現代社會的團結合作感和社羣性正逐漸喪失，基督教會曾在社會經濟問題上提供權威教導，特別是關於公平價格和禁止高利貸（即禁止暴利）等，一切經濟利益考慮都應順從道德權威；但這些教導在宗教改革後漸漸在經濟考慮中消失，導致個人主義和世俗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對窮人的剝削。³ 其實陶尼並非要美化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整個中世紀的經濟制度實際上根本就是農奴制或隸農制，書中不少地方指出封建貴族對農民的壓迫，甚至教會是當時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另一

³ Richard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John Murray, 1926), 68-73, 286, 319-21.

方面，早期改革家如路德、加爾文，及其之後的清教徒雖在宗教教義上作不少改革，但他們的經濟倫理其實基本上都與中世紀的教會教導分別不大，都不鼓勵商業發展，反對暴利和高利貸。陶尼指出清教徒在當時英國社會漸形成一反社會封建主義的力量，並且加爾文對商業和適度利息的接受，成為日後對商業發展給予完全認可的種子。陶尼指出加爾文主義原本包含着兩種相反的元素：一方面強調對商業的約束，強調集體性甚至半共產主義的元素，但由於英國當時的商業貿易發展以致得不到重視；另一方面就是強調個人主義元素，與當時的商業世界氣味相投，慢慢形成一政治力量，漸拋棄了集體性，認為賺錢可以是為上帝更大的榮耀而進行的事業，視勞動為「天職」，為榮耀神的表現，認為貧窮是出於人的懶惰，加上對政府低效管治的不滿，慢慢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⁴ 陶尼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在歷史中一直存在，並非如韋伯所說的是清教神學的產物，但資本主義的確在後期清教神學的某方面中找到激勵的因素，並激發了它的強大力量，增強了它原本就具備的朝氣。陶尼在結論指出世俗社會將社會經濟和宗教分開是荒謬的，思考經濟制度不可單考慮利益，亦要考慮人性需要，人類除了需要物質，亦有靈魂的需要，經濟／效率是為人的工具服侍人的需要，而非成為人的主人。⁵

在《獲取社會》（*The Acquisitive Society*）中，陶尼認為社會制度是道德價值等級的表達。然而，當代社會被自由放任和個人權利原則所支配，不斷鼓勵獲取財富，社會的道德層面因此被排除考慮，工作生活只考慮私利，不考慮社會功能、目的和價值。陶尼因此主張一種「功能性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們以不同程度的競爭和合作，通過向社羣提供一些人們需要的服務來贏得他們的生計。⁶ 在一個功能性社會中，財產

⁴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232-52.

⁵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277-87.

⁶ Richard H. Tawney,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21), 3-6, 29-32.

和經濟活動的存在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的共同目的。陶尼也基於他認為人類是上帝兒女的觀點來主張人人平等。儘管人們在性格和能力上有着天壤之別，人人都應有權受到尊重和照顧，同樣應該能夠充分發揮各人擁有的能力。這種平等不能通過純粹形式意義上（purely formal）的平等機會來實現，例如作為法律特權的廢除或某些限制的缺失，這只會為原子個人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敞開大門，無助於保障公平或創造和諧社會等。所以陶尼並不追求單單形式上的機會平等，而是提升各人發展的條件，達致住屋、健康和教育條件均等，以確保所有人都有實質平等機會培養自然賦予他們的能力。但當時英國大多經濟實力都由私有企業控制，社會經濟和社會環境都極為不平等。故此他主張一些與公共福利息息相關的服務業必須實行「公有制」，如銀行、交通、電力、煤炭、土地、農業、軍備等，並且支持累進稅和擴展社會服務；⁷ 陶尼特別關注教育機會的平等。他批評教育中系統性不平等的惡性循環和更廣泛的階級分層，它使階級分化長期存在，破壞社會團結，並對民主構成威脅。⁸ 對於陶尼來說，教育的目的不僅是追求知識和自我發展，而且是為了加強社會團結精神，讓人們做好準備更好地為同胞服務，以提高社會的整體水平。因此，他呼籲重新分配並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⁹

陶尼平等觀背後更為核心的是他的團契觀（fellowship）。團契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概念，它不是基於特權和從屬，而是基於文明中的伙伴关系，所有人都為之做出貢獻，共享成果。這是基於人與人、人與上帝聯合的概念，人類為此共同目標而產生的相互義務。基於團契觀，一個

⁷ Richard H. Tawney, *Equali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2), 37-41, 103-6, 119, 182-86.

⁸ Richard H. Tawney,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All: A Policy for Labour* (London: Hambledon, 1922), 33, 141-45, 218.

⁹ Richard H. Tawney, *The Radical Tradition: Twelve Essays on Politics,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ed. Rita Hinde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4), 84.

理想的社會應該通過「平等的自由和合作努力」來形成。這與以「既得利益的叢林」和「無休止的階級鬥爭」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成鮮明對比。¹⁰

簡而言之，陶尼的願景是建立一個自由合作的共同體，他們使自由、平等和博愛成為日常生活的實際現實。¹¹ 平等不僅是程序或形式上公平，更是要確保有平等的環境和條件，讓各人發揮所長，並且具能力參與民主。因此，陶尼的政治哲學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筆者認為更準確說應是「基督教民主社會主義」。就着以上對桑德爾和陶尼的政治經濟學的討論，筆者在以下作出幾點分析和反思。

五 反思神學與經濟

無論是韋伯、泰勒（Charles Taylor）、桑德爾、陶尼，甚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傅利曼（Benjamin M. Friedman）都不約而同指出基督教神學對社會經濟理論發展有重要影響，反而神學界於這方面卻不太重視，多少反映陶尼的分析，即基督教神學（福音派或清教徒）於宗教改革之後愈來愈走向個人主義，將信仰個人化，脫離社會關懷。按陶尼的分析，清教徒思想走向個人主義是受當時經濟環境影響，但同時亦反映教會於神學思考上被當時社會經濟環境所主導，失去了加爾文主義原先嘗試兼顧平衡個人主義與社羣主義的向度。筆者認為今天基督教神學應加強信仰的社羣性思考，與社會、經濟理論多作對話和反思，才能更好反映信仰的整全性。

¹⁰ Tawney,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3; Hsiao-Yuh Ku, "Fighting for Social Democracy: R.H. Tawney and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aedagogica Historica* 52, no.3 (2016): 273.

¹¹ Richard H. Tawney, *Why Britain Fights* (London: Macmillan, 1941), 13.

六 論優績與運氣

細心分析，其實桑德爾和陶尼並非原則上反對優績主義，他們反對的更多是英、美的資本主義在優績主義的幌子下造成的不公、對立和分裂。正如馬斯登（Marsden）分析，陶尼堅持挑戰市場無限制的運作和現代工業社會的其他異化特徵。他認為，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就是道德問題，即宗教和道德退到個人領域，出現以財產權和私人利益為主導的機械社會觀。因此，他希望將道德框架重新納入社會和經濟生活，這是對社會弊病的適當回應。¹²

其實，桑德爾自己亦指出優績主義本應是最合乎一般人道德直覺的，按個人能力和貢獻作回報，而非靠面子、拉關係，或因社會地位、家庭背景、種族膚色，或性別影響。理論上，相比自由至上主義，優績主義更能消除一切不公平的歧視，鼓勵地位低微的人能夠透過才能和努力而向上流動，激發人們發奮向上，並強調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本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現實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是一回事，對自己的命運（富裕的社會、家庭背景）負責又是另一回事，命運並不僅僅來自於自己的選擇和行動，而是部分來自宿命、運氣或上帝的恩典（*TM*: 34-35）。桑德爾總結道，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意識到，儘管我們努力工作，但如果沒有適當的社會環境，人們就無法成功。能生活在一個重視我們才能的社會中，我們是幸運的，而不是應得的。知道我們所得到的的是來自上帝的恩典或出生的偶然情況，可以使人謙卑，從而超越優績的暴政，指向更寬容和慷慨的公共生活（*TM*: 227）。

¹² John Marsden, "Richard Tawney: Moral Theology and the Social Order," *Political Theology* 7, no.2 (2006): 193.

七 反思恩典與謙卑

桑德爾的問題是，他似乎高估了承認運氣或恩典對一個人對窮人的道德態度的影響。桑德爾試圖通過訴諸傳統貴族的經驗來強調這些精英成就中涉及的運氣因素，以此來對抗賢能政治的傲慢自大。然而，社會經驗告訴我們，即使那些精英們承認他們的擁有部分是運氣，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會對窮人變得謙卑。正如莫羅（Sophia Moreau）批評桑德爾對戰前英國階級社會的貴族的描繪過於理想化。事實上，即使人們真的認為他們屬於某個特定階級在道德上是幸運，或來自神的恩典，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在道德上被視為平等的。這是因為在貴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以某些方式被訓練和教育，這在他們的社會中是優越性的標誌。¹³ 在華人圈子我們亦可見那些富二代、富三代並不會因他們好運的家庭背景而謙虛，他們自小於富豪家庭成長，反而認為他們高人一等是理所當然。筆者認為單單承認運氣或恩典不會使人謙卑，從聖經角度，謙卑是蒙憐憫蒙恩典的先決條件，而非相反。¹⁴ 使人謙卑的是認識神的聖潔、公義及超越，和認識人的罪，知道自己是不配的；無論多有才幹，在上帝面前其實與其他人一樣都只是罪人，蒙神憐憫和恩典，如此才能形成團契觀，更能體諒貧窮人處境，願意分享他們所擁有的。正如韋伯（Stephen Webb）所說，「你的罪感愈強。……你對恩典的理解就愈清楚」，罪觀幫助我們從烏托邦的幻想中解放出來，於幫助別人同時能保持謙卑，並對於人努力改善個人及社會的成效抱有較現實的態度。¹⁵ 唐斯（Tim Downs）在《預約心靈沃土》亦發覺，美國社會愈是瀰漫着相對主義的氣氛，要呼召人們認罪悔改就愈困難，人們根本不覺

¹³ Sophia Moreau, "What's Needed for Equality of Condition? Comment on M. Sandel's *The Tyranny of Merit*," *American Journal of Law and Equality* 1 (2021): 134-35.

¹⁴ D. C. Searle, "Humility, Pride," in *New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eds. T. D. Alexander & B. S. Rosner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567.

¹⁵ Stephen H. Webb, "Review of James Morone, *Hellfire Nation: 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 *Conversations in Religion and Theology* 4, no.2 (2006): 166.

得自己有甚麼罪。所以唐斯提出福音策略不可單單聚焦佈道和收割，亦要兼顧社會文化使命，作為福音預工（撒種），預備人心來領受福音。¹⁶

八 反思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香港自殖民管治以來受益於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發展，並且大大改善普遍人們的物質生活，並且市場經濟不單有效分配資源，亦相當程度做到按績分配，論功行賞；¹⁷ 尤其對比西方社會的富裕和蘇聯貧窮最終解體，更突顯市場經濟的效率，以致中國於文化大革命之後亦都進行改革開放，為國家經濟注入不少市場經濟元素。馬斯登亦批評陶尼的社會理論涉及烏托邦元素。¹⁸ 筆者認為相對處於三餐不繼的境況，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亦算是重要道德考慮；故此泰勒指出，十八世紀西方思想家支持市場經濟，是因他們發現按市場機制運作，人們是可以達致互惠互利，他們甚至視這支持市場機制的宇宙觀為神設計的天命觀，成為現代社會的道德秩序（Modern Moral Order），故此推動市場化背後亦有其道德的動機，並非單單考慮利益。¹⁹

雖然對於百廢待舉，很多方面都未發展的社會（如早期殖民管治的香港），資本主義的確有效使經濟急速發展，富人和窮人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但過去二十多年的歷史亦反映，資本主義發展到某階段，放任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如環境破壞、貧富懸殊）會愈來愈嚴重，正如桑德爾所說的，雖然經濟繼續增長，但財富都流入富人的口袋，貧窮人的處境愈來愈差，尊嚴亦受打擊，以致形成種種政治怨恨。這與十八

¹⁶ 唐斯著，劉良淑譯：《預約心靈沃土》（台北：校園，2001）。

¹⁷ Thomas Mulligan 指出理論上理想的市場經濟是真的能做按績分配的，所以不少英美傳統主義者將資本主義與優績主義混為一談亦非完全無理由的。看 Thomas Mulligan, *Justice and the Meritocratic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131-34。

¹⁸ Moreau, "What's Needed for Equality of Condition?," 195.

¹⁹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0-82. 其實當時哲學家普遍流行的是自然神論（Deism）的天命觀，與正統基督教的天命觀並不一致。

世紀西方思想家所主張的「市場經濟可達致互惠互利」已相去甚遠，今天更多學者所描繪的社會反而是「下流社會」、「M型社會」，過去主張放任自由經濟的合法性已受質疑。

聖經強調這世界是神所創造的，祂賦予人管理大地的權柄和能力，所以人只是治理大地的「管家」，並非支配者。神讓人承受土地，人犯罪之後「終生勞苦才能從土地得吃的」（創三17），並且反對乘便車不勞而獲（帖後三10）。但另一方面，聖經亦強調以色列人收割莊稼時不能盡取，而是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19～21），為工人提供合理的工作環境及公平報酬（利十九13，二十五39～43；申二十四14～15；賽五十六6；路十7；提前五18）。家族土地不能永賣，並設有贖回條款及禧年等制度，確保家庭最起碼的經濟能力，防止跨代貧窮等（利二十五8～55；民三十六7～10），反映聖經中的經濟倫理的確有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責任的一面，亦有社會主義羣體責任一面。只是由於過去清教徒倫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並且資本主義得以使香港和西方國家經濟成功發展，適逢之前的共產主義國家都主張無神論，以致很多基督徒（尤其是美國福音派）將資本主義等同基督教的經濟理論，忽略了基督徒社會主義羣體責任的一面。²⁰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基督教的經濟倫理應該兼顧個人自由和社羣責任，按時勢在兩者間取平衡，並且融合二者。

九 結論

對桑德爾和陶尼經濟倫理的分析不單反映出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不單有機會造成不公平，更使人與人之間分裂和對立，並且看到神學對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可惜過去受經濟因素影響，教會多只強調個人自

²⁰ 其中一位強烈支持基督教資本主義的知名基督徒學者就是Michael Novak，筆者有文章對Michael Novak基督教資本主義作分析和批判。另外，可參考筆者另有一文討論基督教政治經濟學，可更全面了解筆者的基督教經濟倫理觀。

由、優績和經濟增長一面，忽略了基督教亦強調實質的平等機會、社羣責任的一面。筆者主張基督教的經濟倫理應該是要平衡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並且基督教應強調神的聖潔、公義和超越和人的罪性，這有助形成團契觀，以致在這制度中成功的人亦懂得謙卑，體諒並關懷社會上貧窮的人。

撮 要

本文探討桑德爾和陶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和對英美資本主義和優績主義的批評，並指出從歷史角度看，基督教神學對西方經濟發展其實有重要影響，可惜過去受社會經濟因素影響，教會多只強調個人自由、責任和經濟增長，忽略了基督教強調平等、社羣責任的元素。基於對資本主義和優績主義和基督教經濟倫理的分析，筆者主張基督教的經濟觀應該是平衡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且基督教對神的聖潔、公義和超越和人的罪性的強調，有助形成團契觀，使在經濟上成功的人懂得謙卑，體諒並關懷社會上貧窮的人。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hristian socialism by Sandel and Tawney and their criticism of Anglo-American capitalism and meritocrac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Christian theology has actuall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nom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m only emphasize individual freedom,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gnoring equality and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that are also the elemen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apitalism, meritocracy, and Christian economic ethic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conomic outlook of Christianity should be a balanced fusion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Furthermore, Christianity's emphasis of the holiness, justice, and transcendence of God and human sinfulness can help to form a sense of fellowship, and motivate those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people to be humble, considerate and caring for the poor in society.